

经学今诠续编

中國哲學 第二十三輯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经学今诠续编

《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

《中国哲学》编辑部
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今诠续编/中国哲学编辑部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382-3288-5

I. 经… II. 中… III. 经学-研究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879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459 千字 印张: 21% 插页: 4

印数: 1—3 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定价: 40.00 元

纪念黄宣民先生

《中国哲学》前主编黄宣民先生不幸于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六日病逝。黄宣民是侯外庐先生晚年的主要工作助手，侯先生晚年卧病在榻，言语不利，黄宣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侯先生的学术事业中，协助侯先生继续发表文章。黄宣民在担任《中国哲学》主编期间，为培养青年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常为修改别人的稿件而通宵达旦，而将自己撰写论文的时间压在最后。他说：“改稿可以和作者一起读书想问题，这也是一种精神生活。”黄宣民先生一生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好先生、好同事、好朋友。为了纪念他，本刊特辟专栏，介绍他的生平。

黄宣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生，江西萍乡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

员,湘潭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江西上饶师专朱子学研究室顾问。

黄宣民少年时代就学于萍乡中学,十七岁时在江西参加财经工作;一九五五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九年毕业,旋进入中国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跟随著名学者侯外庐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黄宣民开始发表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七十年代参加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撰写工作;八十年代参加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和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撰写,同时又是“宋明理学史”课题组的联系人。作为侯外庐的助手,协助他重订了《船山学案》(岳麓书社,一九八二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等著作,还选编了《侯外庐史学论文选编》上、下册,参加整理了侯外庐回忆录《韧的追求》,并协助晚年身染沉疴的侯外庐撰写了大量文章。整理出版了明代平民儒者颜山农的遗集《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北京)、陶匠韩乐吾的《韩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北京)、邓豁渠的《南询录》(《中国哲学》第十九辑,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六,长沙)等。个人学术论文有:《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变》、《明代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蕺山心学与晚明思潮》、《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清初理学与乾嘉汉学述略》、《王柏、金履祥的疑经思想》、《王艮》(《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吴虞》(《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探索及其学术体系》等。

近年来,致力于儒学史研究。他认为,从儒家的发展历程

看,孔子继承礼学,又发展出仁学,礼学是儒家对古代礼乐文明的继承,而仁学则是儒学的创造。汉代儒学的主要特征是天人之学,到宋代,儒学发展成“圣人之学”即理学。他认为,中国儒学思想理论的高峰在宋明理学,而学术成就的高峰则在乾嘉汉学。

金华朱学,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但前人很少研究。黄宣民发掘的金华朱学具有不同于其他朱子学派别的思想特色:其一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道德观,宗派色彩很浓;其二是强调“分殊而理一”,注重由传以求经,循此而发展了朱学沉埋于故纸的支离烦琐的笺注学风;其三是疑经精神,反映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朱学面貌。他还指出,金华朱学开启了明初理学,成为洪武儒学的主流。这些概括和分析,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黄宣民对于明代思想有较为广泛的涉猎。他认为,从朱学到王学,从王学到反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最后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是明代思想发展的主脉。王学则是明代思想学术的巅峰。他对王艮及泰州学派的研究颇有特色。如他依据史料考证王艮靠贩卖私盐发家的身世,又如他对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特色的分析,指出其中心思想是平民功利主义。泰州王学的“异端”思想发展成为反封建的叛逆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

黄宣民早年即已从事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他对戊戌以前的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戊戌时期的变法维新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民主思潮、“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都进行过探讨,并有自己的评价。如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怀疑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哲学表现之一。

黄宣民多年来特别注意探求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与近代启蒙思想的连接。他认为,早在明清之际的社会进步思想之中,已经出现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萌芽,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近代思想因素。如早期启蒙者的公天下观念、公仆观念、公是非观念、法律平等等观念和平均地权观念等即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侯外庐学派是中国史学界、哲学界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它以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和独立自得的开拓精神而独树一帜。黄宣民承继了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点,如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强调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动态地把握不同时代的思潮、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再如,注意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对新史料的搜罗,如他发掘整理了《颜山农遗集》,使这一散失民间的重要典籍得以重新问世。又如,注重从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把握中国历史的民族特色。他认为,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现代化不应脱离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编委会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重新认识儒家经典

- 从世界经典现象看儒家经典的内在根据 姜广辉 1
- 英雄模式与孔子传记 [美]韩禄伯 24
- 卦序与易学的起源

- 易类简帛的卦序意义 邢 文 50

《大学》新解

- 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梁 涛 71
- 《毛诗序》在《诗经》解释传统的地位 林庆彰 92
- 汉代的“古今文字”与经“古今学” 杜萌若 119
- 《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张 践 175
-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 陈其泰 204
- 孟喜、京房的象数易学 林忠军 267
- 礼类经记的各种传本及其学派 王葆珏 308
- 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
- 《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王启发 347

郑玄经学思想述评	严 正	397
经学的统一与变异	谢保成	431
经世致用:荆公新学对经学原典精神的复归	张广保	466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思想	浦卫忠	509
经典崇拜与道德自觉		
——朱熹《诗》学析论	张海晏	551
理学化经学的典范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张文修	578
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王中江	613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在清代思想史上的		
重新定位	陈居渊	637

重新认识儒家经典

——从世界经典现象看儒家经典的内在根据

姜广辉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圣经》、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以及中国儒家文明的六经等等。这些经典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历史原因是什么呢?它们各有什么类型特点呢?中国自殷商以来可以徵信的历史有三千余年,其中两千余年是在儒家经典思想主导之下。历史上人们尊信儒家经典,是因为人们的迷信与盲从呢,还是因为儒家经典中自有其作为经典的内在根据呢?

笔者以为,对于上述问题,应将其置于人的本质、人类社会
发展历史的理论视域之上来讨论。

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然而不仅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像蜜蜂、蚂蚁、猿猴等群居而且有内部分工的动物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化的动物。但这一类动物的社会化生活基本依靠其本能,这

种本能千百万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动物没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类属于本能的东西很少,但却有一种所有生物都不具备的特点——自由意志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又有两面性,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人类在不断发挥其物质生产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在创造他们的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社会化生活以不断扩大其社群范围呈现于历史。从一定意义说,人类的历史乃是世界不同族群、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不同道路、不同方式汇聚融合的过程。但人类也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社群之间存在着某种初始的、天然的敌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因此在汇聚融合的过程中往往充满着矛盾、冲突,甚至血腥的斗争。按理说,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化生活方式的同时,应克服人类自身的动物性,从而将自己造就成真正的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和精神内涵的人。然而历史向人们展示的是,在许多时候,人们创造了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创造了异常庞大的社会,但人们由于缺乏应有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内涵,因而生活在一种矛盾、冲突、争夺的人生焦虑和制度焦虑之中。

“经”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当人们的精神素质尚不健全即“民智未开”的时候,却已先进入了一个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生活较为发展的时代。“经”是历史上被称作“圣人”的先觉者为人们所制定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说,“经”体现一定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作用在于维持该社会的整体性和相对的一致性,使某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并在此社会化生活中培养人们应有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内涵,从而成为增强其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精神。

与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相比,中国儒家经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儒家经典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经典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类型特点

说到经典的产生,我们有必要从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尔斯(Jaspers, Karl 一八八三——一九六九年)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谈起,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雅斯培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雅斯培尔斯所指出的现象是一个事实。问题并不在于以什么词语来概括,而是在于:为什么这一“轴心时代”会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是“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出现?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里,我们不想用一种圣人或先知的理论去解释它,而是想从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来说明它,即:技术发明对生产方式的影响,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结构对文明类型的影响。等等。

在我们看来,一个民族的文明包括语言、文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要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是相当困难的。相比之下,一种技术的传播要容易得多。而某种重要的技术的应用,则足以

对一个社会引起飞跃的发展,由此而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便可能同另一同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民族和国家相媲美。我们认为,在上古时代,至少在欧、亚地区的各不同文明国度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古代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民族间的战争、陆地和海上贸易等都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流和传播,这导致了各文明古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性。而这正是轴心时代在差不多的时段出现在各文明古国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如果说上述进入“轴心时代”的各文明古国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先后进入了铁器时代。具体说,希伯来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腊大约在公元前一千至七百年,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七〇—四七七年)进入了铁器时代。

由青铜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的飞跃。因为所谓青铜时代,实际上一直是铜、石并用,此一时代农业工具一直停留在石器阶段。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铁将人类引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②

由于铁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作为军队来源的人口迅速增加,而坚甲利兵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度地提高,从而使战争的规模空前地扩大。相应地,国家机器也随之大大加强,从而对广大疆域的直接政治控制成为可能,因而国家所需要的专门的管理人才和知识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思想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要中成长起来。

铁的发明和使用,在物资上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精神上给人类带来了紧张与不安。生命无常的恐惧、分裂与分

争,奴役和压迫,以及其他种种的肉体的与精神的痛苦,未尝不是这铁器时代所赐。一方面是创造、征服、财富,另一方面是战争破坏、奴役和苦难,时代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中,愈演愈烈,不能自拔。这种情况带给思想家一种非议现实的、反抗现实的思考——对世俗的、功利的社会的反思与超拔,因而倡导某种秩序的、合理的、宁静的、乃至超越的精神生活,因此而有宗教的、道德的教派或学派。

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信条:苦难出真理。各民族的经典都是那个民族的真理。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典,有其酝酿、形成的过程,起初它被某一学派或教派所尊敬和重视。随着这一学派或教派的发展壮大,它为更多的人群所尊敬和重视,成为苦难现实的精神寄托。经,是某种精神性的权威,强调一种带强制的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精神权威在于,要从精神上抓住群众,它本身即是一个精神的轴心,群众要围绕它旋转。

人类文化本有一定的共性特点,这就是说,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在东方也一定会有所表现,反之也是一样。但当文化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的时候,那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便会受到抑制,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最具代表性的是各民族经典所表现的精神的不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差别的社会条件和原因。

作为民族的经典,是其民族精神的直接反映,它产生于该民族所经历的长期而深重的苦难时代。虽然各文明民族在历史上都曾经经历苦难,但苦难的类型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与西亚、欧洲民族不同点在于:华夏民族相传自上古炎帝、黄帝以下,尤其是西周以来,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但大家都认同出自相同的

祖先,是相同的民族。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往往被看做“兄弟阋于墙”,^③他们所感受的痛苦是家国变故、众叛亲离。即使被灭国绝祀,也不会有异民族间的那种仇恨。因而华夏民族当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争的苦难时,思想家所眷顾的是昔日大家族的“其乐融融”,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回到古代已有的文明:亲亲、尊尊、和谐、秩序。

而西亚、欧洲战争是在异民族之间进行的。他们所感受的痛苦是被异民族征服、压迫、奴役的痛苦。在精神上他们需要创造出一个上帝,并通过先知来宣布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以此来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并且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他们必须强调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抗争的精神。

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当华夏民族与西方民族面对苦难,提出应对之策的时候,他们各自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然不同。希腊人在进入文明时,他们的原始部落经历了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和各种遭遇,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受到极大的破坏,产生了脱离氏族制脐带的自由民小农。而正是在个体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瓦解氏族制的基础上,希腊雅典建立了城邦民主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华夏民族在进入文明前的原始时代,“天下万邦”,人口渐众,人们共同面临多灾的生存环境的挑战。为了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巨大矛盾,华夏民族以同祖同根的理念在幅员广大的地区内建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协调职能。^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前提条件,华夏民族在进入文明国家时期,血缘氏族的形式非但没有被破坏,反而被强调和加强,并由此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别,那本民族的经典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精神资源也

就不同。

由于东、西方文明面对不同的挑战,采取不同的回应方略,因而发展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特点。兹列表如下:

一、中国文化与价值取向:历史记忆型、群体团结型、血缘宗法型、伦理型、利益合义型、和谐型、集权型。

二、西方文化与价值取向:神话幻想型、个人英雄型、地缘法律型、宗教型、利益存储型、奋斗型、民主型。

对这一列表,我想略作几点说明:第一,华夏民族由于历史上从未间断聚族生活,集体保存着远古的记忆,那些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各发展阶段的传说,完全符合早期人类的发展规律。这不是人们可以凭空想象出来的。^⑤从考古学的观点看,人类掌握摩擦取火本领的时间要推到几十万年之前。可见华夏民族历史记忆的久远。而西方民族由于较早脱离聚族生活的原因,集体保存的历史记忆也随之断裂了,于是而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触怒主神宙斯的神话。此外,各文明民族都有关于人类曾经历大洪水的传说,在中国相传是由大禹团结和领导各民族集体战胜洪水,而在基督教《圣经》中则有诺亚在天主的指示下建造方舟带上家小及物种逃难的神话。第二,古代西方文化歌颂个人英雄,因而有歌颂武力征服的英雄史诗,古代华夏文化却没有这样的英雄史诗,华夏民族所感戴的是文明的缔造者和重要技术的发明者。第三,因为华夏民族是以血缘家族群体为本位的,因而它的文化朝着宗法伦理型发展;西方民族是以地缘公民个体为本位的,因而它的文化朝着法律宗教型发展。宗法伦理引导人善性的推扩;法律宗教限制人的恶性的膨胀。第四,从利益原则而言,华夏民族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道德为最高命令,牺牲私利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西方民族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宗教体现高尚精神,个人捐献会在天国得到加倍的回报。第五,亦因为华夏文明是以家族群体为本位的,所以它是强调和谐精神的,是主张家长式的集权政治的;西方文明是以公民个体为本位的,所以它是强调奋斗精神的,是主张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的。

总之,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各由其文化基因而有其合逻辑的发展。两种文明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若将二者向对方转换和改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将是一项文化基因转变和变异的大工程。

由上述可知,经典是一民族通过长期的社会苦难所积累、凝结的生存智慧;民族的文化巨人是通过对其作文化整理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通过强化对它的信仰来增强的;民族的文明体系也是以它为核心价值来构筑的。

二、儒家六经的形成过程

古人称某些权威著作作为“经”,此“经”字所从取义,盖有二说:一是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经,织从(纵)丝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织之纵丝为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此说以“织之纵丝”为“经”之本义;二是刘熙《释名·释典艺》所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说以路径之“径”为“经”之本义。

关于“经”字的本义,我以为当从字音说起。先民在造字之前已有“经”的声音,此“经”的声音究表何义?经、径、茎、胫数字